



國民政府時期之 中英關係

1927

- 1950

杭立武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杭立武著

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

附 訪英簡筆

臺灣商務印書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 一冊

附訪英簡筆

基本定價八角正

著者 杭 立 武

發行人 朱 建 民

印刷及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校對人：梁敏華 張樹怡

序

余參與中英關係，垂數十年，嘗思將所聞見與直間接之接觸，作一簡述，以供國人參考。適西德慕尼黑大學金德曼博士於今年六月召開「中國與西歐研討會」，邀請歐洲、日本與中華民國在美及在臺學者數十人，對中華民國與英、俄、德、法等國暨中美、中日關係，宣讀論文，詳加研討。余被邀講述中英關係，因便撰述「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一文（按國民政府自一九二七年沿用至一九四八年行憲止），略述由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至一九五〇年大陸變色止兩國邦交之起伏。承商務印書館允予刊印。並附抗戰時參加中國訪英團返國後在中央日報陸續發表之訪英簡筆萬餘字。按同時訪英者尚有王雲五先生，彼曾在商務印書館印行訪英日記，甚為暢行，因此中華書局亦徵得余之同意，

由該局將訪英簡筆刊印單行本。惜已散失，幸黨史會之陽明書屋，存有當年之中央日報，經請胡克難君前往手抄全文。又原著中英關係一文係用英文撰寫，經王昭麟君譯成中文，並承鍾虞人君加以潤飾，順此一併致謝。

杭 立 武

七十二年九月

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目錄

序·····	一
一、背景·····	一
二、中英關係進入新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	四
三、從蘆溝橋事變至珍珠港事件（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	九
四、三國聯盟，艱渡難關（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	一四
五、中英新關係之高峯與突變（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	二七
本文參考書目·····	三三
附 訪英簡筆·····	三七

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

一、背景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五〇年間，國民政府時代中英關係之背景，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自一八四〇年至一九二六年間，英國在滿清割地、退讓賠款之衰敗時期，扮演一主要帝國主義角色；第二階段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五〇年間，英國認識一新中國正在成長，對中國採取一般同情與合作之政策，但有時亦表現一種猶豫不決之態度。

一八四〇年之鴉片戰爭，產生南京條約，清廷割讓香港，並開放五口通商；南京條約，是中國與外國政府之首一不平等條約。隨後，中國又與英法在一八五八年簽訂天津條約，又於一八六〇年與英國簽訂北京條約。事實上，此兩

條約均爲南京條約之延伸。

中國政府與人民所感受之欺侮與恥辱，引發愚昧之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壓倒此一事件，並強迫清廷簽訂一九〇一年之北京條約，此一條約內容包括對八國之大量賠款。

在蘇俄對中國有擴張之野心下，英國與日本在一九〇二年簽訂同盟條約，嗣後，英國發現日本對中國更具侵略野心，因此在華盛頓會議後，英國於一九二一年宣布與日本之同盟終止。

所有不平等條約及其他有關條約，造成一重大影響，即證明清廷已無救藥，唯有建立一共和政體，中國方能重建。

孫中山先生領導此一革命運動，推翻滿清，於一九一二年成立中華民國。但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不幸出現北方軍閥相繼爲奪取控制中央政府而發生戰爭。孫中山先生有鑒於此，乃在華南組合國民黨之革命力量。孫中山先生逝世後，即由 蔣介石將軍肩負統一與重建中國之巨任。

一八九六年，孫中山先生在倫敦蒙難，曾獲英國友人及政府之援手，在重獲自由後，孫中山先生留居英國，並撰寫完成其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爲三民主義之最後一部分，而三民主義形成中華民國憲法之基礎。此可謂英國對我國之間接貢獻。

雖英國爲認識新中國之最早國家，但英國在不平等條約保障下所享有之特權，依然繼續維持，此類特權在經過艱苦奮鬥後，方始廢除。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中國學生示威抗議外國帝國主義，若干學生在上海英租界被印度巡捕擊斃，引發全國性反英示威與罷工。自此次五卅事件後，相繼發生若干事件，如六月十一日漢口事件、六月十二日九江事件、六月二十三日沙基事件、七月二日重慶事件、七月三十一日南京事件，此類事件均發生在一九二五年，乃新興民族主義所導致之結果。

國民黨之北伐大軍，引發國家意識與感情，迅速節節前進。英國察覺此一新潮流，乃派其傑出外交官藍浦森(Miles Lampson)前來因應。藍浦森於一九二

六年到達中國，抵華後即往國民政府臨時所在地武昌，彼與中國外交部長進行多次友好會談，在其返回英國大使館所在地北平後，即向倫敦提出報告，並向各國大使館分致備忘錄，表明英國政府基於新情勢，將採取一新中國政策，此一照會同時建議，在中國產生正式政府後，列強應發表一共同聲明，表明彼等將就修正條約及其他問題，進行談判。此一行動實具有政治家風範。藍浦森在一九二七年華人與英兵及水手毆鬥之漢口及九江事件中，進一步表現其能力，彼將英軍撤出上述兩地區之租界，並同意中國部隊和平進入該地區，而平息此一事件。

二、中英關係進入新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

一九二七年為歷史性的一年，國民政府自廣州武昌而定都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政府宣佈關稅自主，自此我國海關不再受國際控制。美國對此首先承

認，英國繼之，由此顯示美國開始在中國問題上扮演領導角色，而英國亦仍然扮演一重要角色。在此同時，中國分別與其他國家簽訂新約，廢止以往不合理之海關權利，從此，中國對國家關稅擁有完全自主權。

在一九二九年，英國將所佔據之鎮江（Chinkiang）特區，歸還中國。一九三〇年，英國政府履行其在一九二二年所作之承諾，將一九〇一年庚子賠款一千一百一十八萬英鎊，退還中國（其時美金與英鎊之匯率為一英鎊比四點八美元）。中英同意此項退款專充建設基金，作為中國生產企業之貸款，其利息則用於教育與文化。同年，英國亦將威海衛租界地及在廈門之佔據地，歸還中國。一九三五年，英國政府在重新評估中國財政情況及香港與中國之經濟關係中，遣派特別經濟代表李茲羅斯爵士前來中國。

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間，中國政府與人民除緊急備戰防止日本侵略外，並積極從事經濟建設、交通現代化、關稅改革、公共衛生改善、教育與研究發展等工作。雖然幅員遼濶，物質缺乏，上述工作，却完成若干重要部分。

研究此期之歷史學家頗有認為中國在此十年期間之進步，遠超過以往五十年來之成就。薛光前先生在其所編「艱苦之十年——中國之建國努力」一書序文中云：「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之十年中，乃中國建國努力最艱辛之十年，亦為最光輝之十年。」（見紐約聖若望大學叢書，「艱辛之十年——中國之建國努力」，第十一頁至第十二頁）。

一九二八年，全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與「北平協和醫學院」，為中國現代研究工作與人員訓練，奠定基礎。全國性之衛生署亦隨之成立。

有一部分之英國歸還賠款，用於南京與鄰近九省間長途電話線鋪設工程，建成中國第一大型電話通訊網。余其時以「中英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總幹事之身分，曾與英國代表馬錫爾爵士（Sir Robert Calder-Marshall）共同簽發價值六百萬英鎊之支票，以完成粵漢鐵路之建造工程，此款用以購買英國材料並作為在中國與英國銀行發行同等面額債券之保證金。此外，並以部分退還賠款，建

造南京至浦口之輪渡系統，因此，在粵漢鐵路於一九三六年完成後，南京與廣州間之交通，得以通行無阻，此一交通建設，在解決廣西 (Kwangsi) 叛變及抗日戰爭中，曾扮演一重要角色。

在此期間，中國與英國之商業關係，大為改善，英國工業聯合會亦在上海設一辦事處。

為促進兩國間之文化關係，余於一九三三年在南京成立「中英文化協會」，此一行動獲得藍浦森爵士之支持，當時，彼已昇任駐華大使，「中英文化協會」乃中國首先成立之國際性文化組織，以後方相繼出現「中美」、「中法」等文化協會，直至今日，由余陸續在國內及香港以至倫敦倡立之「中英文化協會」仍在推動中英文化關係。

在此期間，中國之民族主義意識正日漸高漲，自一九三一年日本侵佔瀋陽後，明白顯示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侵略之野心。

國際聯盟曾試圖阻止日本之侵略行動，但却遭遇失敗，「國聯」曾派由英

、美、法、德、意五國組成之五人代表團前來中國，此一代表團由李頓爵士（Lord Edward Lytton）擔任團長，於一九三二年發表調查報告，但日本並不予理會。「國聯」隨設立一由十九國組成之特別委員會，以研究中日問題，該委員會於一九三三年發表報告，主張不承認由日本扶植之滿洲政府，於是日本宣佈退出「國聯」。自此，政府對於經濟建設工作不得不稍延緩，而轉為準備全力抗戰。在此同時，自亦有多人仍抱持戰爭可能延後或避免之希望。在國際上，中國固獲得大多數國家之同情，但僅有美國首先指責日本之侵略，英國隨之亦譴責日本，就雙方利益言，英國當較美國更為關切中國，事實上，中國固仍重視中英關係。在一九三六年，當中國北方戰雲密佈之際，中國派遣一高階層代表團赴英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此代表團由當時之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所率領，孔氏乘機與英外相及財政大臣舉行會談，當時，英國外相艾登（Anthony Eden）向孔氏保證英國對中國之支持。

英國對華政策雖以「國聯」之決議為基礎，但張伯倫政府却趨向於姑息主

義，事實上，當時英國正與日本在東京舉行雙邊會談，討論如何保護英國在華之利益問題。無論如何，英國在公開場合，仍與美國採取聯合立場，反對日本軍事侵略，同情中國政府之處境，並考慮對華之財政貸款要求。

貨幣穩定為政治穩定與抗戰之主要關鍵。在此方面，美國再度以領導者姿態援助中國。一九三六年五月，中美雙方簽訂貨幣協定，英國亦考慮採取同樣行動。隨事態演變之趨勢，中、美、英三國已逐漸步向同盟關係。

三、從蘆溝橋事變至珍珠港事件（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

自日本在一九三一年入侵瀋陽後，中日間之戰事斷續進行，然中國與「國聯」對達成和平解決，仍抱一線希望。但蘆溝橋事變與緊接而來之日本侵略行動，終使中國陷入八年抗戰。英國「觀察家日報」駐滬特派員對當時之情況曾在八月九日有如下之描述：「最特出之情形是……中國之民族意識正在擴大

……中國可能對日進行抗戰，中國已經到達一個國家儘可能忍受之地步，並且一面保持其自尊。」

正如英國曾經獨力進行保衛戰，中國亦獨力作戰自衛，所不同者，中國之保衛戰時間更長。英國明知其命運與中國之戰爭及未來亞太情勢，息息相關，但英國仍然對日本事務上保持小心謹慎姿態，同時，英國駐日大使在東京繼續與日本舉行雙邊會談。

英國對日本之態度實已超出一般忍耐之範圍。一九三七年八月，英國大使許閣森爵士 (Sir Hughe Knatchbull-Hugessen)，乘坐大使座車，車頂上並鋪有英國國旗，在由京赴滬途中，遭遇日機機槍射擊，許閣森爵士身受重傷。

在此一事件之前，蔣委員長曾經召見許閣森爵士，並要求英國採取行動，譴責日本侵略行爲，蔣委員長同時亦向美國作同樣要求。一九三七年十月，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日本在中國之侵略行爲。

在一九三八年，美國首先給予中國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隨後，英國給予

中國信用貸款五十萬英鎊。

在此同時，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 蔣委員長，表達其對中國人決心反抗侵略之敬意。

在一九三九年，英國照會日本，重申英國支持華盛頓會議九國協議中有關尊重中國主權之協議。

同年，中英平準基金會 (Sino-British Stabilization Fund) 成立，英方由羅吉斯 (Cyril Rogers) 擔任代表，以穩定中國貨幣。

一九三九年五月，英國與美國首次聯合照會日本，聲明日本無權改變上海租界地之地位。

日本與英國在東京之談判繼續進行，日方提出種種要求，例如進入英國租界之英國人，包括婦女在內，均須受日軍之全身搜查，一九四〇年六月，英國在日本之壓力下，背棄對中國之諾言，英國應允交出存在天津中國銀行之中國政府白銀，蔣委員長爲此深感憤怒，並命余即日向英國大使提出強硬抗議。